



教 学 快 讯

第 61 期（总第 219 期）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编

二〇一四年五月

目 录

新闻快讯

- ◆ 转专业难题求解
- ◆ 简政放权：教师考核评价 重绩效还是重发展？
- ◆ 陕西鼓励高校开展多层次共建合作提升高教质量
- ◆ 苏州大学：倡导“无手机课堂”让课堂回归本真
- ◆ 访清华教授钱颖一：人才培养要避免短期功利主义
- ◆ 课堂“低头族”，如何抬起头？
- ◆ 钱伯初：“兴高采烈去讲课”的“钱先生”
- ◆ 林晓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课堂里遇到的最大挑战
- ◆ 卢晓东：让学生参与创造的进程

教改动态

- ◆ 南京财经大学“微课堂”整合学生课后“微时间”
- ◆ 福建工程学院尝试育人新路：地方文献变公开课
- ◆ 中国科大：只有个性化才能锻造出“尖子中的尖子”

教育评论

- ◆ 中美本科教育之差异
- ◆ 林建华：中国大学面临挑战与变革
- ◆ 分层分类视域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策略

转专业难题求解

转专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救济制度”，针对学习有困难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给他们发现兴趣、发展个性提供一条可以选择的途径。但是，在国内一些高校，转专业已经异化成为奖励制度，“学得好转出去，学不好继续留下来”。

初次见到小洋，他反复在向记者阐释一个观点：他已下定决心转到文科专业。

小洋是北京某“211工程”大学大二的学生，填报志愿时他将热门专业会计学填在最前面，并同意了“服从调剂”。最后，他去了一个从未填报的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如今，小洋缺乏学习的激情和动力，每一天都过得很不开心。

每年，有着与小洋类似经历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到，选专业时望文生义导致误选、因分数级差未被理想专业录取、服从调剂进入陌生专业，是造成大学生对专业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

从近年来高考招生咨询会上学生、家长对转专业政策的关心，诸多高校对转专业政策的松动可以看到，国内高校转专业的改革已经成为势在必行之举。然而，目前的转专业政策并不完美，尚存转优不转差、转专业机会过少等问题。在这当中，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转专业的逻辑呢？

转优不转差

根据大多数学校的政策，像小洋这样的学生想转专业，学习成绩必须排在全年级的前10%或15%。可现实情况往往却是，学不下去、不适合学本专业的学生排名在后10%、15%。

“如果我学得好，为什么要转专业呢？既然我不适合学，为什么不让我转专业？”小洋很疑惑。

尽管近年来转专业的“口子”在一点点撕开，但以成绩作为学生转专业的标准，似乎成为了高校中的共识。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平”。

经历了多年转专业实践摸索，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表示，低年级转专业确实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问题，毕竟学生高考的考分不同，从低分专业向高分专业流动，一个比较让人服气的标准就是成绩。

为了公平起见，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允许转专业学生从高考高分录取专业向低分录取专业流动，但不允许反向流动。

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郑超伟则认为，大一各专业所学的主干课程基本一致，并未涉及过多本专业的知识，如果大一学不好，即便转专业也未必能学好新专业。

然而，公平并不能与合理划等号。叶志明告诉记者，高年级学生想转专业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学生不想学本专业，兴趣不足导致多门成绩不及格；二是学生不适合学本专业，即

便努力了也会考不及格。这时候如果再用成绩排名限制转专业，学生能否毕业都很成问题。对此，上海大学采取综合学生前两年学习轨迹，结合教授面试的方式，推行高年级学生转专业。

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直言，转专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救济制度”，针对学习有困难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给他们发现兴趣、发展个性提供一条可以选择的途径。但是，国内高校转专业已经异化成为奖励制度，“学得好转出去，学不好继续留下来”。“其结果是本专业拔尖学生转走，到新专业后绝大多数人不再拔尖；本专业不拔尖、学不下去的学生留了下来，最后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高度不断下降。”

放开与不放开之间

与成绩论尴尬并行的，还有转专业的机会。

多数高校的转专业政策到了大二末，就戛然而止了。而这个时候，很多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兴趣培养、发展走向、就业趋势，才刚刚回过神来。他们还没来得及作选择，选择的机会就已经没有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招生办公室教师告诉记者，之所以不敢放开高年级转专业，高校最大的担心是害怕教学秩序混乱。高年级转专业的先例较少甚至没有。“如果某个专业的学生在大三时集体转走很多，将严重影响教学秩序。”

“如今国内高校转专业制度的设计，实际上保护的是学校的劣势专业。”别敦荣指出了转专业通常的两种情况：一是冷门专业学生过多转到热门专业，导致冷门专业可能开办不下去；二是一些基础学科以及办学质量不高的专业，学生大多有可能要转出去。

那么，放开转专业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在国内，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少数学校均采取无门槛转专业，允许本科生就读期间多次转专业（包括在大三期间转专业），并允许学生二次转专业。

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周旭峰坦言，学校每年转专业的人数大致在350人左右，维持在总招生量的15%，其中也出现过个别专业转出过半的情况，多年坚持下来，并没有出现大问题。此外，学校也参考就业、高考录取、转专业等环节反映出来的数据，减招和停招了部分专业。

叶志明也承认，在上海大学转专业政策实施初期，一些基础学科也遭遇过所剩人数无几的“阵痛”。但经过学生的理性选择，过去较少人选择的历史、哲学，出现了外专业学生因兴趣而转入的情况。

事实上，放开转专业并不等于扰乱教学秩序。相反，周旭峰认为，转专业带来的压力正是做好专业建设的动力。一个专业转出的学生较多，有可能是在课程设置、培养定位、招生宣传等环节出现了问题，找到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有所提高。

叶志明对此表示肯定，“学生转入新专业通常要延期毕业，之前专业的学分大部分不予承认，学生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的代价；学校培养学生也有相应投入，虽然不明显，但也要间接付出培养成本的代价。但是，付出这些代价与学生能否顺利毕业，与学生能否由此成才相

比，并不算什么”。

招生应尊重市场机制

实施转专业政策初期，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由于转专业的主体是学院，某一专业转走的学生较多，某一专业接受了太多成绩较差的学生，学院都会有意见分歧。

这些意见分歧是转专业改革中的共性问题，也是改革的阻力。为了推行转专业政策，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从学校到学院层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叶志明先后与教务和学工系统开了60多次会议，统一大类招生、转专业的思想。

在转专业的配套政策中，两个学校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采取大类招生，做好专业分流。在叶志明看来，这是保证学生逐渐提高专业满意度的第一步。

叶志明表示，没有进行大类招生之前，原本要淘汰的专业，由于有“服从调剂”，某个专业只要有任课老师存在，计划招生数与实际招生数总能画等号；而大类招生后，每个专业的实际招生数总是小于等于计划招生数。“‘=’与‘≤’是两个不等的概念，前者代表的是计划经济，后者采用的是市场机制。小于或等于某个数字，也可以等于0。”

他解释，经过计算，他发现专业的承载量大于学生总数，这就意味着类内分流、跨类转专业的过程中，有些专业招不满或招不到学生。而这些专业下一步通常面临的是专业整改或及时停办，教师不可谓不紧张。

经过10年大类招生探索，周旭峰发现，高校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时，应重视各专业分流不平衡的情况。大类里的专业有相对热门与相对冷门的专业，“如果说完全尊重学生选择热门专业的意愿，热门专业有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培养能力；如果刻板地根据招生规模用成绩来卡，就有可能出现热门专业全是成绩好的学生，冷门专业则全是成绩差的学生，这样并不利于专业培养”。

对此，他认为，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选择情况对专业规模进行调整，某个专业申请的人数较多，可以适度扩大接受量，做到总体上满足大多数学生的意愿。另外，学校在设定大类时应该考虑学生将来的选择情况，如果大类中个别专业特别冷门或特别热门，也可以考虑将其拿出来按专业招生。

引导学生理性选择是关键

那么，有成功的例子在先，无门槛转专业、增加转专业的机会、大类招生等做法能否大力推广？

叶志明提醒，同样的改革在专业分科根深蒂固的高校进行，将触动很多学科、教师的利益，阻力非常大，照搬并不一定适合。“不妨学习改革背后的逻辑、方法和思路，弄清改革要如此进行背后的原因。”

而在别敦荣看来，如今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大学的改革模式，实际上是在专才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学生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某个专业去培养。因此，怎样给学生专业的指导，使得学生在转专业时能够充分利用机会，促进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是高校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

这实际上也是周旭峰一直思考的问题。“目前看来，学生在专业选择上还是存在问题的，有些热门专业想转的学生特别多，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大学采取了新生研讨课、院系开放日等形式，让学生在入学之时就与教授接触，了解专业发展的趋势。加强学生转专业的引导之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出现了学生申请转专业成功，但办理转专业手续时却选择放弃的情况。“这说明学生转专业更加理性了。”周旭峰说。

别敦荣则认为，个别化的专业指导还得跟上。毕竟新生研讨课、院系开放日针对的是群体，尚不足以解决学生转专业和个性化发展的问题。学校想要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就要求教师应当不仅懂得学科专业，还懂得学生的学业发展、个性发展的规律，能够针对学生的性格特点、知识基础、就业去向等因素做个性化的辅导。

在转专业之外，别敦荣还提醒，高校应重视解决专业不均衡发展的问题。“虽说专业水平有高有低是办学中的常态，但一所高校应该有专业办学水平的基准要求，防止出现差距过大——好的专业非常好，差的专业非常差，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中国科学报 2014-5-9

简政放权：教师考核评价 重绩效还是重发展？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不能为了考核而考核，将考核局限在与绩效、利益等挂钩。要将发展性评价贯穿到教师的评优评先、职务职称晋升、提高待遇等管理过程的始终。

教师考核评价改革是近年来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不仅为教师的入职、晋升、聘任、培训和奖惩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也有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整体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

改革之“惑”：教师考核评价缺乏整体设计

2013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通过设立教师队伍改革试点示范项目、借助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资管理研究分会的工作平台，了解发现高校在推进教师考核评价改革方面有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调研发现一些高等学校对教师考核评价机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教师分类管理、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机制创新、强化聘期考核等方面做了探索和研究。

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在教师考核评价工作中还存在一定偏差，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存在着缺乏整体设计，主体、手段较为单一，标准体系不完善，与绩效、利益挂钩过于紧密，发展性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等问题，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亟待改进和完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尤其是功利化评价倾向，应引起高校领导和人

事师资部门的高度重视。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如何从奖惩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转变，是今后应着力解决的带有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改革之“鉴”：教师考核引入发展性评价

发展性评价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教育评价的新理念新模式。发展性教师评价指依据一定的发展目的和发展价值观，评价者与教师一起制定双方认可的发展目标，运用发展性评价的技术与方法，对教师的素质发展、工作职责和工作绩效进行价值判断，使教师在发展性教育评价活动中，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不断实现不同层次的发展目标的过程。

发展性评价是美、英、日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教师考核评价方式。上世纪末发展性评价概念引入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经过理论和实践研究，普遍认为发展性评价具有互动性、面向未来、关注个体差异、评价主体多元化、注重过程、引导教师全面发展等特征，契合了高校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创造性等特征，应该成为今后我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的主要形式。

改革之“路”：考核不再以绩效为主

针对高校当前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将借鉴推广高校改革试点项目有益经验，坚持发展性评价的改革方向，改革完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机制。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加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政策指导。针对目前教师考核评价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教师工作司已委托南京大学牵头开展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课题研究，并以课题研究为基础，适时出台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将明确发展性评价的改革方向和重点，对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工作实施分类指导，为高校开展教师考核评价改革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二是确立发展性评价理念，重塑教师考核评价目标定位。要改变以绩效考核为主的考核制度，把教师考核评价目标定位于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与持续发展。要根据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等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区分不同类型学科的特点和差异，提出有针对性的考核评价政策和指导标准，促进教师的成长发展，实现教师个人与学校发展的“双赢”。

三是实行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奖惩性考核为辅的考核评价模式。发展性评价的“软指标”评价在目前对部分教师还缺乏有效约束和激励，奖惩性考核采用的“工作成果导向”的定量评价方式，在要求教师完成教学科研基本任务、奖优罚劣、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方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弥补发展性评价的不足。因此，盲目的全盘否定奖惩性考核是不可取的。只有将这两种考核方式结合起来，以发展性评价手段为主，奖惩性手段为辅，才能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两种考核评价模式各自的优点，形成推动教师和学校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四是将发展性评价贯穿于教师管理的始终。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不能为了考核而考核，将考核局限在与绩效、利益等挂钩。要将发展性评价贯穿到教师的评优评先、职务职称晋升、

提高待遇等管理过程的始终。通过全程的发展性评价，检视教师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在教师的每一个职业发展阶段帮助其实现职业道德的提升、个人知识素养的提升、教学科研能力的提高，帮助教师完善职业发展规划，找准职业发展方向，促进教师更好、更快地成长。

五是结合聘用制改革，完善考核反馈机制，建立健全教师退出机制。要按照发展性评价思路，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创新教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分级考核、分级负责的教师评价激励体系。全面实行教师聘用合同制，科学合理设置聘期目标，加强聘期考核，严格合同管理。完善教师人事争议处理机制，探索建立教师流转退出机制。要将教师考核评价的结果及时反馈给每个教师，掌握和解决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对于经考核评价确实不能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缺乏职业发展潜力的教师，要引导他们有序流转到更为适合的其他岗位，切实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中国教育报 2014-5-19

陕西鼓励高校开展多层次共建合作提升高教质量

陕西积极鼓励高校扩大开放合作，加强国际、省际和省内高校在办学、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深层次合作交流，以学习借鉴提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国内影响力。

陕西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以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为目标，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积极引进优质资源，吸引国外高水平大学、专家学者和团队来陕合作办学，开展面向海内外聘请“学术院长（系主任）”、“学术校长”试点，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办好孔子学院，支持开展国际间学生交流、学分互换互认、学位互授联授，以教育交流促进人文交流。

陕西要求，高校省际交流要结合发展定位，瞄准国内高水平大学，选派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研修访学、交流挂职。通过学科共建、加强教学科研合作等多种形式，在学习中借鉴提升，逐步缩小与高水平大学的差距。

同时，今年陕西将启动实施省内高校“对接牵手”计划，由“985工程、211工程”大学、省属高水平大学与其他本科高校开展对口帮扶。通过高校“对接牵手”计划等方式，推进西安市域内高校之间和市域内高校与市域外高校之间对口支持，推进名师授课、精品课堂、重点实验室、实训中心、培训基地、馆藏图书、期刊资料等多方面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省内不同高校间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深层次合作。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5-20

苏州大学：倡导“无手机课堂”让课堂回归本真

如今，手机日渐成为生活必需品，大学生更是人手一机，“手机依赖症”成为这一群体的集体症候，终日几乎手不离机，刷微博、发微信、玩游戏……甚至在上课时也不例外，这种现象不免让老师们为之担忧。

小高是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女生，正在读大三的她坦言，“手机依赖症”的症状她全有：除非是手机落在宿舍，不然肯定是随身带着手机的，上课也一样。公共课时，会用手机看电子书，专业课上，她会自制许多，但仍会无意识地掏出手机，刷一刷微博、玩玩微信。“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会影响听课，可有时候就是管不住。”小高形容说这是一种“瘾”。

虽然智能手机所具有的多种功能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了不少便利。可以及时记录下老师当天的讲课内容，有疑惑的时候可以直接上网寻求解答，“有了它就不再需要计算器了”，“沟通无所不在”……但老师们也普遍反映，同学们这种对手机的过度有瘾让现在的课堂慢慢变了味儿。

为了调整这样的状况，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苏州大学文学院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探索。学院向全院师生发出了“无手机日”的倡议书，倡议大家从‘无手机课堂’做起，“抬起头看看周围的世界，低下头倾听书本的声音”，让良好的学风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随着倡议书的发出，学院首先在个别班级进行了课堂试点，通过班长等同学课前敦促同学上交手机的方式，让同学们上课时远离手机。“虽然起初有不少同学表示不理解，甚至还有学生到办公室跟我理论……”文学院学工办主任纪金平老师谈起此次“无手机课堂”的实施过程感慨良多。但通过两周的试验，活动慢慢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支持，“上交手机”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

日前，记者来到文学院“比较文学概论”课堂一探究竟。一进教室就看到在最前排左侧的课桌上，放着一个橙色的小收纳盒。同学们来到教室后会自觉地将手机关机或静音放入收纳盒。但也有个别同学还是坚持把手机带在身边，“我需要看时间，而且想把老师上课的ppt拍下来，但我不会在上课期间用手机娱乐。”

一堂课下来，记者发现，同学们听得都很专注，认真的做笔记，对于老师的提问也积极响应，老师说到好玩的地方也会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课堂气氛很是活跃。

“刚开始我也挺不习惯的，手机上交后上课老想着，时不时的会不自觉的摸摸口袋。一周下来就慢慢习惯了，上课专注了，觉得挺好的。”班长钱佳甜同学对于学院的这项倡议活动很是支持。“以前一到教室同学们就开始各自玩手机，现在手机‘上交’了，课前大家会翻翻书本，预习或者回顾下课程内容，上课时听讲也不会总想着不时的玩玩手机，课间同学之间的直面交流更加的频繁和融洽，班级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我觉得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不玩手机，这首先是对课堂、对知识的最起码的尊重，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有疑惑的时候同学们不再依赖百度，而是自己动脑筋思考

或者相互讨论，边听边想这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文学院比较文学概论任课老师吴雨平对无手机课堂也很赞成。

吴雨平很感慨地告诉记者，以前自己站在讲台前认真投入的上课，而学生们坐在座位上不时地埋头看手机，刷微博、玩微信、逛淘宝、看电子书，上课容易走神，与老师没有互动，自己在课堂往往变成次要角色，而手机反倒成了主角，“现在总算像个课堂了。”

但学院的这一新举措也有不少学生吐槽表示不理解，“大学了还让我们上交手机，真是对大学生自制力的侮辱。”此外，也有不少同学反驳，“如果老师上课内容足够吸引人，足够精彩，我们也不会去玩手机啊。”

“许多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并未成熟，因而不能对他们的自制力理想化，在他们管不住自己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和措施的约束，来避免可能发生的不规范行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健谈起这一举措的初衷时感叹，采取这样的方式只是一种手段，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同学们能慢慢养成上课不玩手机的习惯，让提倡变成一种习惯，渐渐戒除“手机瘾”，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据悉，苏州大学文学院目前已在本院推广“无手机课堂”举措，学校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也在本周开始试行“无手机课堂”，之后还有可能在全校范围内推广。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5-19

访清华教授钱颖一：人才培养要避免短期功利主义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世界经济亦面临全球化竞争加剧；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世界。所有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管理类人才培养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短板？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其根源何在？大学中的商学院如何利用大学优势发展管理教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前夕，记者围绕以上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世界范围商界顶尖人才鲜有中国人

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初，管理教育对我国民众来说比较陌生。20 多年过去了，管理教育在中国火爆异常。近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分为几个层次，发展概况如何？

钱颖一：目前，我国的管理（学位）教育有四个层次。一是本科教育，学生年龄大约 18-22 岁；二是无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的研究生管理教育，学生年龄大约 22-24 岁；三是具备大学学士学位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人士攻读的全时或在读的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在 30 岁左右；四是有多年管理工作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攻读的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年龄为 40 岁左右。

这些年来，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进步很大。以 MBA 和 EMBA 为例，在短短的 20 多年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著的。有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在教育部批准设立的 39 个专业硕士学位中，MBA 是第一个举办的，为之后设立其他专业学位教育的定位、规范等起到引领作用。第二，在 39 个专业学位中，MBA 和 EMBA 的规模最大。虽然工程硕士学位整体规模更大，但其中专业领域分类繁多。第三，MBA 和 EMBA 在教育质量上的成绩也很亮眼。在权威性的英国《金融时报》EMBA 百强排行榜上，2013 年全球前十名中就有 3 个是中国大陆的学校，加上中国香港的学校共计 4 个。这种国际认可程度在国内高等教育的各学科、各项目中都极为突出。

记者：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我国管理教育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钱颖一：中国的管理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2013 年，中国的 GDP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三。仅从 MBA 和 EMBA 来看，现在我国每年招收 4 万多名 MBA 学生和 8000 多名 EMBA 学生。而美国一年招收 MBA 学生 15 万人。这还只是每年入学的流量差距，美国的 MBA 毕业生存量更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对管理类人才培养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受益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这种受益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趋势，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中国的管理类人才与欧美等国家的管理类人才差距何在？

钱颖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商学教育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中鲜有中国人。当然，我国的管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我们与印度相比，也显得有某种差距。比如，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管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人。但是国际顶尖商学院院长中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在全球财富 500 强中，微软的 CEO、百事可乐的 CEO、德意志银行的联执 CEO、花旗银行的上任 CEO 都是印度人。然而，在非源于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CEO 中没有中国人。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人的背景，大都是在印度国内念完本科或者硕士，再到美国等国家深造，之后进入商学院或商界。

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关系？我曾经认为，与印度相比，造成中国人缺席国际商界顶尖舞台的原因是语言障碍。不过，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培养出的人才英语水平越来越高。我也曾经思考，是不是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但现在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我猜测，这里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方面英文叫做“mind-set”，中文可翻译为“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这就与教育相关。

中国教育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二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很高。能够有这两点优势并不容易。这种人才优势在中国处于经济追赶期、向国外模仿学习的阶段有积极作用。但是，一旦走到技术前沿，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创新能力、领导力上就显得不足。这与学生的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密不可分。

记者：您说的这种能力，对于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对于管理类人才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钱颖一：相比工程、技术类人员，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往往更多地与社会打交道、与组织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应具备的能力要更加综合。追溯商学院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里，其名称是有一定变化的：20世纪初成立的基本都叫商学院，“二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叫管理学院，近些年，有人提出应该叫“领导力学院”，都说明对培养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无论学生是到国企、民企、外企，还是当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其中就包括思维定式或心智模式。

要警惕“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何在？

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教授的两个EMBA班做对比，一个是中文班（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一个是国际班（大多数是外国学生）。两个班学生提问的问题类型很不一样。中文班的学生关心的都是当前的企业问题、行业问题、刚刚发生的或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国际班的学生更多地是对你讲课的内容进行追问、挑战。前者关注的是实际问题（practical problems），后者关注的是思维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s）。这就是不同。

我在听取本科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会听到一些学生抱怨有些课对找实习单位或找工作没有用，比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哲学伦理等课程。他们希望学院多开和早开一些对找工作立即有用的课，比如会计、金融等。

记者：不过，与管理教育相关性很大的经济学，本身就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

钱颖一：是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高盛集团在北京招人时，向来面试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当利率变化的时候，某种证券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在纽约招人时，不太会问

金融、会计方面的问题，往往会问与历史、哲学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与应试者探讨关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前者，他们是招聘技术人才，而后者，是招聘未来要培养的领导者。这是在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定位。

记者：教育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否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分不开？教育毕竟不处于真空环境。

钱颖一：教育既反映社会，又服务社会，还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而我们目前大环境就是短期功利主义。比如，我们追求当年 GDP、喜欢引用增长数据，但是不会讲数据背后的故事，仿佛数据本身就是目标。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你的解读方式是什么？实现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牺牲了什么，付出的长期成本又是什么？我们不去深究。

记者：对教育的评价、教育者的评价，是否也有这种短期功利主义倾向，进而影响了教育者的教育教学？

钱颖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思想性的工作，不是流水线上或程序化很强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度量其质量的工作。因此，不能用计件制、记工分等通行办法来评价、考核教师，否则容易导致数论文篇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大都是采用计件制、记工分制的教师薪酬制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华经管学院从 2009 年开始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这个改革要着眼于“大学”、“教师”、“创造性工作”这三点重要特征。正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有长远打算的空间，我们对教师的科研评价由原来的一年一评，变成三年一评，由原来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

记者：这些年，您比较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多场合都有提及，这是不是也是对抗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举措？

钱颖一：现在的一些通识教育也很急功近利。我一直认为，通识教育不是为了简单地扩大知识面和增加知识，不是为专业知识打基础，也不是作为专业的补充，而是为人的一生做准备。所以，通识教育比专业教育更注重长远。

我在 2011 年发表的《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一文中强调，通识教育是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为一体的教育体系。价值塑造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诚实、诚信、正直、宽容的人格养成；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生目标。在能力培养方面，要特别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想象力是超越现有的知识和框架；而批判性思维则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并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而核心知识的获取既有历史知识也有现代知识，既包括中国的知识也包括世界的知识，既涵盖文科知识也涵盖理科知识。这一理念也与清华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的传统相一致。

从根本上说，如果把学校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知识传授，那就偏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人才培养，一些人理解为落脚点是“才”，而我认为首先是“人”。

记者：您曾经在 2012 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开学典礼上做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演讲，您怎样理解“有用”与“无用”？

钱颖一：我们身处一个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这里的“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是短期的有用，而非长远的有用。有趣的是，当我与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当时看上去“无用”，但后来长期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乔布斯曾经这样反思他在大学时上的一门美术字的课，这对他后来发明电脑上的字体很有影响：“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清楚和显然。”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在2009年秋季学期推出了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为理念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中有一门叫“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很有意义。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学院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

记者：我听说，去年夏天您为被经管学院录取的所有本科新生推荐了暑期书单，出于何种考虑？书单包括什么？

钱颖一：这份书单有10本书，包括：《魔鬼经济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哲学的思与惑》、《科学哲学》、《回归大学之道》、《史蒂夫·乔布斯传》、《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学记》、《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闲访谈录》，以及《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读书可以启发思路，扩展思想，引导思考。读书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读书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比如《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这本书，它是一个外国人写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书中描述的事情大都是我们中国学生所熟悉的，但是他的观察角度，他所描写的感受，却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角度的分析，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大学中的商学院具有独特优势

记者：人们往往把商学院分成两类：大学中的商学院，例如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独立商学院，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您认为扭转短期功利主义倾向、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大学中的商学院有哪些优势？

钱颖一：处于大学中的商学院更有利于不同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比如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可以更方便地与清华工科学生、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一起交流。我非常喜欢形容乔布斯的一句话——他“站在艺术与科学之间”。

记者：听说您经常去中学了解基础教育，比如今年1月份您去了北京十一学校，是否也是希望得到与此相关的一些经验或启示？

钱颖一：我会定期去中学走一走，了解我们的学生是从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向大学的。今年1月，我去了北京十一学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没有传统班级的概念，学生根据

自己的选择走进语文教室、生物教室、地理教室，这些教室都布置不同。学生的住宿也不按照年级划分，而是混住。

目前，清华大学的本科生都是按照院系专业划分宿舍的。比如，经管学院的男生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而这一栋楼里恰好也只有经管学院的学生。学生每天接触最多的都是本学院的人。这对学生成长有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们每天沟通的对象主要都是同专业的同学，用的都是同一专业语言。如果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经常同中文专业、法律专业、电子专业、建筑专业的学生沟通，他们的沟通能力会提高。第二，不利于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多元化的个性发展。很多学生走入清华后，往往不到一个学期便没有了自信，而美国的学生进入顶尖高校鲜有这种情况。这和同专业的学生每天在一起，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在分数上进行攀比有一定关系。由于经常接触到的都是同一专业的同学，造成学生发展路径容易趋同，也不利于学生多元化的个性发展。如果不同专业的学生交叉混住，进行更多交流，可能会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缓解。

记者：如何更好利用大学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学科交叉性？

钱颖一：我举一个例子。创意、创新、创业是管理教育关注的未来焦点。去年4月，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 x-lab”，中文称为“x-空间”，它的定位是清华大学的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这是一个由清华经管学院发起、牵头，联合了清华14个院系，一起打造的从创意，到创新，再到创业的教育平台。1年来，已经有250多个项目申请进入清华 x-lab，入驻场地团队53个，注册和正在注册公司的项目52个，融资超过3300万元。这个平台面向清华所有学生和校友。

把它命名为“x-lab”，是取“x”中的两个含义，一是探索未知（x代表未知数）；二是“交叉”，即学科交叉。在创意创新创业教育这项探索上，我们跟国际上的领先商学院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是一个我们展望未来管理教育时的新焦点，我们既有潜力，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创新管理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领先。

记者：有人质疑现在的一些创业教育也很急功近利，在真正培养人的创新思维、能力上短板明显，如何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减少这种现象？

钱颖一：对于创业人才的缺乏，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创业的基础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创意，根本还是要从创意做起，不能太急功近利。现在的一些创业教育，也反映出短期功利主义，很多创业者就是“随大溜”，人家都搞IT、互联网，他也搞，提出的想法趋同，没有新颖的内容。所以我特别强调在创新、创业之前加上创意。这又涉及前面提到的思维方式的培养、学科的融合、通识教育的探索等。

记者：我联想到当前一些人对本科阶段开设管理教育专业的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万金油专业，学生在知识积淀、专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据我了解，您本科在清华大学读数学专业，到美国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之后才到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从而进入经济学领域并成为知名经济学家。您怎样看待本科阶段管理人才的培养？

钱颖一：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美国，除了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外的7所常青藤大学，在本科阶段都不开设管理（商科）专业。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也都没有本科管理专业，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在本科开设管理专业第二学位。这些大学都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开设管理专业，主要是MBA教育。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绝大多数州立大学都会在本科开设管理（商科）专业。不过，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不分专业，实行通识教育。不像我们，大学一年级就分专业。

我国的情况应该具体分析。据统计，当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好的专业是经济类、管理类和工程类这三个专业类别。考虑到市场需求，开设工商管理本科专业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认为，本科管理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对学生视野和能力的培养。

记者：除了您以上的阐述，为实现我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化，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钱颖一：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创意、创业、创新的人才培养是管理教育中的一个新趋势。第二，不同学校的管理教育应有不同的侧重，差异化是未来管理教育的又一趋势。第三，我们要高度重视慕课（MOOCs）和在线课程给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带来的冲击，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而要积极应对，借助新技术进行教育创新。

中国教育报 2014-5-16

课堂“低头族”，如何抬起头？

你听说过高校“低头族”吗？不管老师讲得多卖力，他们总是头也不抬地紧盯手机，刷微博、看朋友圈、追电视剧、玩游戏。对他们来说，上课时能忘带课本，却不忘揣上充电宝。

如今，这样的课堂“低头族”已成为众多高校中的一道“风景”。而不少学校也开始费尽心思地予以防范：有的出台严厉的“扣分”政策，有的要求学生在上课期间统一上缴手机，还有的干脆安装信号屏蔽机、上课期间断网。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只“限行”却未“收心”的举措在短期内确实能取得一些效果，但时隔不久，学生总能“下有对策”，课堂“低头”的窘况也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上大学不费脑子，费流量”

“小学上课费嘴，初中上课费笔，高中上课费脑，大学上课费流量。”“每天第一件事是睁眼，第二件事就是看手机，上课怎么会不玩？”提起上课玩手机，北京某高校资深“低头族”小陈有着一肚子俏皮话，“有时候也不是老师讲得不好，但自己就是每隔几分钟要刷下微博、看看朋友圈，要不实在受不了。”

对于学生的这种行为，山西某高校教师刘方刚开始“确实看不惯”，现在却也见怪不怪了：“上课不到十分钟，底下拿着手机看的就有一大半。还有学生发帖说，‘游戏最高分全都是上课时打下来的’，太悲哀了。”

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随机采访了十余名学生，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会在课上玩手机”，但也存在“看人、看课下‘菜碟’”的情况。

“选修课人多，老师也管不过来。”“反正期末也不考试，教的东西又简单，上课随便听听就行了。”“讲得太没意思，以后也用不上，玩会儿手机打发时间。”几位刚刚下了选修课的学生告诉记者，如今选修课不仅是逃课的首选项，而且成了课堂“低头族”的“重灾区”，而管理不严、课程考核形式松散、授课内容无味等则是学生“低头”的主要原因。

可在随后一堂专业课上，这些学生课堂表现却特别好，“刚刚上的是系主任的课，谁敢玩手机？专业课知识点过得也快，稍不留神就要落下”。还有学生表示，如果老师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职称比较高，或在考试中比较严格，课堂上“低头”的现象也会随之减少。

除了课程和老师，年龄的不同也导致了课堂上“低头”程度的不同。一位长期负责教学管理的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刚刚从高中教育的严格管理下解脱出来，还不能很好地适应需要更多自主管理的大学课堂，使得部分学生缺乏自律意识，没能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

此外，记者发现，研究生班级人数往往少于本科班级人数，便于管理；而且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多以课堂讨论、小组研究为主，课堂参与程度较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生“低头”的现象。

为何放不下手机

本该认真听讲的课堂，却变成了游戏网络的“天堂”。为改变这种窘况，不少高校开始寻求改变：扬州大学用了“屏蔽法”，高价购置了一台手机信号屏蔽器，上课时间断网；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则出台“连坐法”，向任课教师的“熟视无睹”开刀，如果发现课堂上有学生在玩手机，老师又置之不理，将根据玩手机人数的多少，按照教学事故来对老师进行处罚；华中科技大学则有学院出台了“没收法”，如果发现学生上课时玩手机，将被没收一个月。

“这些措施都会被学生‘破解’。”刘方所在的高校也采取过类似措施。如果在课前暂存手机，学生要么说没带，要么干脆花几十块买个破手机上交，课上依然捧着智能手机玩得不亦乐乎，“关键是学生内心特别反感这些规定，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不能被这么管着。”

“我在美国访问过的几所大学校园内基本都覆盖wifi信号，注册后学生、教职工可以免费使用，上网非常方便。除了有少数老师明确要求课堂内不准使用手机、iPad等设备，多数老师对此持开放态度，不设任何限制，他们认为现今的环境要禁止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很不现实。于是我留意了美国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的情况，在所听的几门课中，除了《多媒体新闻采集》老师要求学生使用手机等设备外，其他课上学生很少会拿出手机，这让我觉得意外。我跟美国学生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常常反问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大学，上课为什么要玩手机？’”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南京理工大学教师卢晓云如此撰文反思中国学生对手机的痴迷，“这是一个观念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学生对学习机会的获得普遍缺乏珍惜感，甚至会觉得是在被迫完成任务，自然会敷衍了事，上课刷手机也没有任何负担。我曾经在课

上对玩手机的学生说，‘父母辛苦挣钱供你们上大学，你们上课却埋头刷手机，对得起他们吗？’结果收效甚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同样认为，不管是断网还是上交手机，都是“治标不治本”，更需要反思的是学校本身，“为什么课堂吸引不了学生？就是因为有些课程固化、没有新意，更没有针对学生成长的需要：教师只能按照学校安排授课，局限性太大；学生除了上课，很少有机会能找到老师。师生缺乏交流，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学生很难找到归属感，只能寄托于手机和社交媒体。”

治“低头”要多管齐下

课堂“低头族”的眼睛何时能离开手机，看向黑板？

“要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校的交流。”储朝晖说，“交流多了，学校和教师了解了学生的想法和需求，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些学校采取了‘导师制’，学生一入学就有专门的老师指导其学习和生活，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刘方则认为，应该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入手：“一是改进授课方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不受欢迎，可以多借用新媒体手段吸引学生注意，并增加课堂互动；二是变革考核方式，严把‘出口关’，总有学生觉得课程‘水’、背背就能过，可以多增加随堂测验的环节，帮助学生养成连贯学习的习惯。”

“老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有效利用新媒体，将智能手机作为服务学习的工具、将手机屏幕作为课堂的延展。如果不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即使今天杜绝了‘低头’现象，当有一天类似谷歌眼镜这种不用‘低头’的新技术产品普及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把学生注意力拉回课堂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崔艳认为，随着移动手机媒体时代到来，要想根治课堂“低头”，还应该顺应潮流、提高学生的新媒体媒介素养，如建立微信公众学习平台、线上线下互动学习模式等。

光明日报 2014-5-22

钱伯初：“兴高采烈去讲课”的“钱先生”

2014年4月30日19时33分，首届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兰州大学资深教授钱伯初先生在过完第82个生日的第二天，因病医治无效，长眠于坚守了60年的兰州。

钱伯初先生，1933年4月29日生，江苏省无锡县人。1957年支援西北建设调至兰州大学工作，曾任物理系副主任。2003年，他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4年获评为兰州大学资深教授。钱伯初在国内量子力学教学领域享有盛誉，深受师生尊敬，被尊称为“钱先生”。

三尺讲台 一生守望

钱伯初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北大任教不到半年，即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当时人才紧缺的兰州大学。

钱伯初博学审问、深思笃行，一生守望兰大，始终如一地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坚守三尺讲台近 60 载，对学生精心教育、授业解惑。已过古稀之年的他，仍坚持每周两天乘校车前往榆中校区，给本科生上课，风雨无阻。在主讲《量子力学》课程时，钱伯初发现学生的《力学》课程基础知识不够，他就主动要求先由他给一年级学生讲授《力学》课程；讲授《力学》课程时他又发现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不足，他又在课前先给学生补充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

“我从来不觉得给本科生讲课是低水平工作，它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是一门艺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竭尽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讲课更是如此。只要可以，我想在讲台上讲到 80 岁，还是讲我的基础课。”钱伯初在 2009 年兰州大学“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颁奖礼上曾向全校师生说。

钱伯初心系青年教师成长，尤其是在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和由他主讲的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后，主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上。他通过开放课堂供青年教师观摩等方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教师，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钱伯初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

热爱生活 淡泊名利

钱伯初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在教学领域之外，他还积极参与足球、排球、门球、乒乓球运动，古稀之年时还获得了甘肃省老年乒乓球赛单打冠军；他的围棋、象棋水平也有口皆碑，是围棋业余六段位，曾任甘肃省围棋协会理事。

在女儿钱秉中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乐观地跟她聊天，无限信任她，从不强求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她说：在生活物质方面，我爸说只要一个东西还能够使用，就没有必要去花钱买新的。”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罗洪刚说：“钱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国家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钱先生还保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简朴程度，非常让人感动。而且他不追逐名利，从没有为了评职称而去刻意发表论文，而是把自己所知道的都用最简单的方法阐释，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实在难得。”

兰州大学物理学院 96 级学生李征在怀念钱伯初时说：“我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有一种由衷的亲切和敬佩，总感觉他们与这个熙熙攘攘的红尘保持了一个有尊严的距离。”

2009 年 8 月 27 日光明日报 10 版（大学生生活版）刊出走进兰州大学专题，钱伯初为此写了一段寄语：“讲课是我的主要工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乐趣。通常我总是带着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兴高采烈地去讲课。许多创新讲法，往往并不是事先准备好，而是在课堂上当场发挥想出来的，是一生中激情的创造。希望同学们也能带着激情去听课，使思维

活跃起来，听课才有最好的效果。”这是钱伯初对自己教学的评价，也是对学生们的殷切期望。钱伯初对于治学的态度、对于生活的态度值得我们永久怀念。

光明日报 2014-5-12

林晓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课堂里遇到的最大挑战

前几天，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小杨，她是今年哥大教育学院刚刚录取的百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之一。跟几个月前她给我的感觉不同，这次她看起来很紧张，表情里甚至带有几分痛苦。我关切地问她这三个多月的学习和生活进展如何。她说：“嗯，怎么说呢，我很喜欢统计、编程、教育经济学之类的课，因为课上老师讲得很多，我也感觉很适应。但是，那些以课堂讨论、口头报告、小组辩论为主的课程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我一到星期二晚上就失眠，饭也吃不下，因为周三有两门讨论课。”我接着问她为什么讨论课让她这么痛苦。她说，“唉，我的那些美国同学都很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整堂课都听他们不停地提问题、讨论。而我呢，根本插不上嘴，光忙着听他们在说什么，好不容易我自己想出一些答案，下课铃却响了。唉，我感觉自己特别笨，连别人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接着说，“林教授，愁死我了。您说我该怎么办？其实不光我，我的好多中国同学都有类似的“讨论课程恐惧症”，您快帮帮我们吧。”

为什么美国的课堂喜欢讨论式教学？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一点：美国的课堂充满讨论、辩论和自由提问。教授们鼓励学生根据提前布置的阅读材料自由提问、深入分析、批判性地思考和吸收前人的观点。这种教育方式背后蕴含的丰富理念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学生不仅向老师学习，而且也应该尽可能多地与同学交流并互相学习，教授绝不是学生们汲取知识的唯一途径。二、同学拥有和老师同等的提问与质疑的权利。

然而，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在他们看来，学习就获取正确答案或者标准答案，而课堂讨论和互相提问始终没有直接给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这怎么能行？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在开学几周后来向我抱怨。她说：“林老师，我没有从您的课里面学到任何东西，您的课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当我问其缘由的时候，她说：“您从不告诉我们任何答案，却一直让我们这些学生利用大好的课堂时间去讨论。您也看到了，学生们对您指定的阅读文章理解很不一样，大家的看法似乎都有有道理的地方，讨论来讨论去，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更不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您觉得这种讨论有意义吗？难道不是浪费时间吗？我父母花了这么多钱让我来读书，是让我从顶尖教授那里学习知识的，不是听一帮同学谈他们的个人看法的。”面对这位同学的问题和困惑，我首先表扬了她。因为她敢于和我交流、并直接提出她所遇到的问题。如果她不告诉我她的困境，我可能永远无法帮助

她解决眼前的问题和挑战。我告诉她，勇于交流绝对比默默放弃要好得多，跟某些从不跟老师交流就直接退课的学生来说，她的做法已经说明她具备了起码的沟通能力。接下来，如果她能再往前走一步，调整自己的定式思维和心态、尽力去适应美国课堂的授课方式，她的求学之路很可能会平坦许多。但是，这位中国学生后来的几句话却让我非常惊讶：“林老师，我之所以来找您，说出我的困难，因为您也是中国人，我猜想您一定会理解我的苦衷和困难。如果您是一位美国教授，我会直接把课退掉，再去选一门我更习惯的课。”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像这位同学以及小杨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少数，他们在课堂上遇到的问题也往往具有共性，不善于参与课堂讨论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而且，他们会错误地默认美国教授不会理解或帮助国际学生解决遇到的困难。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学生往往只知道寻找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熟悉的对象倾诉，寻求帮助。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论是同文化背景还是跨文化背景，只要通过充分有效的沟通，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点，我在前几期的专栏中也讨论过。

确保在美学习成功的三大必要能力

前不久，我请 35 位美国大学教授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些教授执教于美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所教授的课程涉及科学、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们的回答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美国教授的普遍看法。第一个问题：在你们的课堂上，中国学生经常遇到哪些困难？第二，你会建议中国学生提高自己的哪些技能，从而让他们在学术上获得成功？

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第一：良好的写作能力；第二，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3)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特别是跟教授和同学。下面，我们对这三种能力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

(1) 良好的写作能力

“坦率的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Siegal 教授这样回答。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观点。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西北大学[微博]经济系的 Voli 教授的回答很给我们启发，“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点。”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觉得写作难。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我们在本科的时候没怎么写过这样的东西，老师也没教过该如何写学术的文章。”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来看，他们确实需要提高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好多学生要么无法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不

知道如何佐证自己的看法。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学阶段继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

是不是英语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水平？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很多教授。他们都说，英文水平确实会有所影响，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两个因素：大量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抱怨教授们布置的阅读材料太多了。确实，在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阅读量动辄就上百页。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告诉我，每两周读一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对她的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范德比尔特大学工程学院的 Jonnason 教授说，“要想写得好，首先要多读。一个读过 50 本书的人肯定比只读过 2 本的人写得好。”

此外，不少美国教授指出，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不足也导致了中国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其实，必要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学术写作同样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多位教授在问卷回答中指出，中国学生在课上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听。他们需要有质疑能力，需要问问自己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或者证伪前人或者其他人的观点。对于中国学生习惯以考试成绩高低论优劣的思维模式，这些教授们颇有微词也颇为担心。他们认为考试分数决不是唯一尺度，学生思考能力的提高是评判学习效果重要指标。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 Johnson 教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你的美国教授肯定愿意跟你一起合作或者协助你。但是，这需要你有尖锐的看问题的眼光去质疑已有的知识，而不是重复那些别人已经发现的理论。”一位纽约大学的教授说，“中国学生很善于总结，但不善于批评、分析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我们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提问让我们可以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提出问题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记录和抄写只能是肤浅的理解，而提问或者批评指摘才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提问除了对理解学术文章大有裨益，对于有效的社会性交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提问可以帮助交谈双方发现共识所在，这在协作或者团队性合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提问有利于控制话题的走向。还是以课堂讨论为例，通过提问可以帮助你把手题转移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上来，实现了成功的话题转移还担心自己无话可说吗？事实说明，许多中国学生觉得参与课堂讨论难也跟他们不会问问题有关。第三，提问可以让交流的目标更加明确，让交流的过程更加有效，可以避免鸡同鸭讲的状况。

(3) 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亚利桑那大学的 Levin 教说在答卷中抱怨，“不论我怎么鼓励我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不说话！。在我的课上，最安静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国学生。他们不说话，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内容。”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 Gomez 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我真的不太理解，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他们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

(1) “从小我的父母和老师就告诫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再讲出来。”(2) “在没想清楚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浅薄的表现。”(3) “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事实上，当时你发现自己想的跟别人不同时，恰恰应该说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帮助你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并帮助你迸发新的想法。我曾经这样鼓励班里的学生表达他们的想法：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头脑风暴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会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视野和头脑，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机会吗？

我建议那些不善于参与课堂讨论的中国学生先尝试跟自己的教授多交流，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困惑，或者把在课堂上没有机会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的一对一交流会大大增加你的自信，并转化成参与课堂讨论的动力。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小洪学生以前从来不跟教授们交流，在我的建议下，他跟自己的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进行了 30 分钟的谈话。事后听小洪说，这位教授非常耐心地听他谈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给予了深入的指导。教授甚至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给小洪，请他阅读并指出文章里存在哪些问题。这是小洪第一次尝到跟教授个别交流的甜头。逐渐地，他有了信心，开始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上面谈到的三种能力对于培养有创造性、有适应性的学生尤其重要。中国的教育界需要进一步关注并思考：我们的学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时表现如何？哪些能力的欠缺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成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提高学生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是否为培养全球化的人才做好了准备。

共识网 2014-5-22

卢晓东：让学生参与创造的进程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位于美丽的海滨，风景十分秀丽。这所高校有一个特殊的学院，名为“创新学院”（简称 CCS）。创新学院成立于 1967 年，至今有 47 年历史，已经培养出 1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00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罗尔·格雷德。格雷德 1979 年高中毕业进入创新学院学习，主修生物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创新学院培养出来的杰出校友

很多，格雷德只是一个代表。

创新学院现任院长为古生物学家布鲁斯·蒂凡尼。当笔者问他创新学院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布鲁斯回答道：“创新能力不是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学生天生就有创新能力。”

创新学院努力将创新能力强一些的人选出来，给他们提出更高挑战，并让他们亲自参与到创造进程中，使其创新能力及早呈现。

挑战和参与创新是创新学院的核心哲学，这些核心哲学已经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挑战意味着难度较高的课程。创新学院的学生由于对其未来方向已有很好把握，因而他们选择课程时，可以越过大学前两年的通识教育阶段，直接选择专业课程，许多为他们开设的课程都是小班研讨课。学院在大学四年都安排导师指导，具体包括微调教学计划、指导和联系学生参与科研工作等。学生选课可以超越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划分，直接选择研究生课程。

在制度设计中，该学院允许一部分学生通过3年+2年的学习进程，完成1个本科和1个硕士学位（在UCLA也有类似的灵活的制度）。学生可以在主修专业之外，选择辅修专业，也可以选择双学位专业。各专业教学计划安排中，都有一个课程组要求学生在其他领域选修，以此拓宽学生知识视野。

创造的具体内涵是本科期间直接安排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及其他类型的创造性活动，让学生由一般的知识消费者直接转变为新知识的创造者。该校物理学院教授、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克罗墨的一段话成为该校本科生科研的标志性概括：

“在本科期间积极参与研究工作是将学生塑造为终身学习者最好的方式。参与研究需要三项基本条件，一是好奇心，二是愿意学习标准课程中没有的新东西，三是愿意参与解决整个人类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创新学院在本科生科研方面，除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本科生科研项目外，还特别鼓励学生参与暑期（三个月左右）的短期科研项目，为此学院专门设置了“暑期本科生研究奖学金”予以鼓励。

创新学院的学生可以有限度地自由选择专业。为了保证小班研讨课教学、导师辅导工作的有效性，目前创新学院学生可以选择的专业为8个，其中自然科学方面5个，分别为生物学、化学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物理学；人文和艺术领域的专业有三个，分别为文学、艺术和作曲。对于人文和艺术领域三个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创新活动的主要内涵变为直接参与艺术创作，例如小说和诗歌写作、艺术表演、作曲等。

创新学院本质上是一所本科生荣誉学院，同时也是一所住宿学院，学院要求学生在学院宿舍住满三年。在这一点上，创新学院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有类似之处。

在专业选择的逻辑方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大部分本科生属于文理学院，他们在二年级后才选择专业。圣塔芭芭拉分校本科生约有18977人，创新学院只有384名在校生，因而该校实际只有不到2%的学生能直接选择专业并且进入专业学习。与该逻辑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国内大学要求大部分学生入学前就选择专业，只允许少部分学生在大学两年后自

由选择专业。

那么，能够在大学入学前就恰当选择专业的学生，到底是多数还是少数呢？加州大学认为大部分学生两年之后才能很好地选择专业，了解自己并了解学科，更加成熟地对未来有所构想，我们则认为只有少部分学生才能两年后选择专业。谁对谁错？或者哪种教育组织制度更加高效呢？

认为大部分学生在通过大学本科教育前两年适当的通识教育后，才能更高效地认识自己和认识学科领域差异，这就是三所高校文理学院教育组织制度的基本逻辑之一。以上逻辑与我国高校的专业选择逻辑顺序是相反的。或者这是问题的答案之一吗？

南京财经大学“微课堂”整合学生课后“微时间”

一个初夏的午后，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黄蓓蓓同学来到艺术学科楼，看到“微课堂，微体验”海报，内容是“法国的左岸右岸——求学波尔多”，而主讲人是她喜欢的彭涛老师。她赶紧从“口袋大学”手机软件系统选了彭老师的讲座。走进教室后，她用手机在门口负责签到同学的手机上扫了一下二维码，就完成了活动注册。

每位同学落座后，面前都添了一杯咖啡，“今天不像上课，像是下午茶”，黄蓓蓓听到旁边两个女生的议论。彭老师的讲座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很多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围着彭老师提问。在后面的微课堂，传媒与动画系的庄唯老师主讲的“巾帼不让须眉——古典小说中的女侠”，艺术1103班李小伟同学主讲的“茶叶与茶具——茶文化趣谈”，同学们都听得饶有兴致。

为了整合学生午后、傍晚、课余的休息时间，引导他们进入第二课堂学习，南京财经大学利用午后、晚间30分钟的休息时间开设了“微课堂”。

鉴于青年学子关注事物范围广、关注点多，关注时间却短暂的特点，这些课程摆脱了传统课程的系统性和持续性，更为灵活、主动、活泼，更注重人文性和师生互动。南财工商学院的“幸福微课堂”，每期录制10分钟左右的微视频，请来了心理学博士、校团委老师、同学中的社团达人、校外的杰出校友，录制了“解语新世纪幸福”、“幸福生活启示录”、“职场幸福法则”、“奋斗的幸福青春”等4个视频，讲述他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对幸福的感受。录制好的视频上传到线上，同学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人人主页、微博点击视频链接观看，仅仅花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幸福”的各方说辞。

南京财经大学一系列的“微课堂”内容涉及专业知识、人文交流、党课学习、课外实践、志愿服务、挑战杯作品等。“微课堂的特点在一个微”，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周亚芳介绍：“设计微课堂的初衷，就是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把中午半小时这一看似微小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邀请老师和同学用一种轻松休闲的方式交流，课堂传播的知识点小而精，广而新，打造一种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

福建工程学院尝试育人新路：地方文献变公开课

“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福建工程学院2012级学生刘周读到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诗作《国仇》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学校的一堂公选课《林纾的爱国情怀》上，刘周首次接触到这首诗。“这节课就像是个引爆思维的导火线，它打开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仿佛可以回到那个年代，林纾奋笔直书，以笔为刀，自己的爱国情怀便全部写在了纸上。”刘周说，作为一个爱国者，林纾把民族大义放于胸中，以自身的能力理性而又切实地爱国，值得大家反思和学习。

“真没有想到，一段福州的历史竟能引发同学们如此高的学习热情。”这节课的主讲老师祁开龙说，“为了有更好的教学效果，我搜集了马尾海战的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给学生们看，大家都很震撼，百余人的课堂，鸦雀无声，学习结束后，不少同学写学习心得给我，阐述自己的爱国观。”

祁开龙为学生们上的这节课是福建工程学院给全院学生们开设的《走进林纾》公选课中的一节。

“让历史财富铸就人文精神。”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仁华告诉记者，学校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从去年开始，学校在对福建地方文献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形成公选课供全校大学生学习，效果明显。

“这就是大学文化的正能量。”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张旭说，学院办学历史可溯源至1896年林纾、陈宝琛等著名闽绅创办的“苍霞精舍”，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自身特色，让学生们了解校史，才能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珍惜在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

人文学院教师庄恒恺给学生们的授课内容主要是林纾艺术领域的研究。“讲到精彩之处，学生们的眼睛都会放光。”庄恒恺说，首次尝试用这种方式给学生授课，觉得是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为了配合公选课，学校编辑出版了《林纾读本》作为教材，发放给所有学生。该书的副主编、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福建工程学院苍霞学者郭丹教授告诉记者，教材特地选取了林纾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人格魅力、爱国情怀、艺术境界的作品，使林纾文化深入师生心灵、林纾精神滋养师生，成为修身正德、治学育人的示范。

郭丹说，随着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读图”已成为当下青年读者阅读的主要特点，教材为了适应大学生的阅读需求，选取了数十幅林纾的书画作品编入书中，这些书画与林纾的诗文相得益彰，使学生们对于林纾的了解更为立体和深入。

吴仁华说，下一步学校还将在已汇编出版160册《福建地方文献汇编》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福建地方文献资源的整理研究，在林纾及闽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研究、福建民间文献研究等方面不断寻求突破，并形成一系列特色公选课，邀请更多知名人士来校授课，开辟出一条高校传统文化育人的新路子。

中国科大：只有个性化才能锻造出“尖子中的尖子”

德国《先进材料》是国际材料科学领域的顶尖期刊，近日，它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成骥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这是石墨烯的光电调控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

成骥的成长得益于学校为他提供的“个性化”培养方案。早在大二时，他就来到导师曾长淦教授的实验室，跟着高年级研究生熟悉仪器，从实验助手做起。对研究方向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他对石墨烯光电效应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得到曾长淦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自己搭建实验仪器，开始了独立研究，有了实验成果后，大四开始撰写论文。

“本科阶段就进入前沿实验室，从做实验到撰写论文发表，接受了完整的科研训练，我感到本科四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此。”目前，成骥已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是中国科大2009级严济慈物理科技英才班的学生。

2009年3月以来，中国科大与中科院有关研究院所联合创办了11个科技英才班，对特别优秀的本科生进行重点培养，旨在求解“钱学森之问”，造就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据中国科大副校长陈初升介绍，该校科技英才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等7个基础科学类英才班，及计算机与信息、材料等4个高技术英才班，分别以曾在中国科大任教的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命名。华罗庚班等5个基础学科英才班2010年入选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科大英才班共招收1556人，已毕业485人，其中459人毕业当年继续深造，包括196人到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加州理工、斯坦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国际一流名校，263人被保送到国内著名科研院所和高校，读研率94.6%（全校平均为72%）；华罗庚数学英才班等5个基础学科英才班继续深造率高达98.4%；严济慈物理英才班2009级46名学生全部读研，其中39人赴世界名校深造。

“英才班毕业生读研率远高于全校平均值，显示出投身科研的志向，培养质量也远高于全校平均水平，初步达到了创办科技英才班的目的。”陈初升说。

在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看来，英才班培养模式的核心是“三结合”：“科教结合”，给学生接触科学研究前沿的机会；“理实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学生的原始创新能力；“所系结合”（院系与研究所结合），优化学生全过程的成长条件。

据了解，英才班学生实行“两段式”培养，第一阶段基础教育在校内进行，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数理基础；第二阶段专业教育由中国科大和中科院相关研究院所联合完成。各英才班结合本校“注重基础、强化交叉、突出前沿”的培养特色，推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构建新的适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课程体系。在强调基础的同时，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研究性学习。

“我们能让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有机会到国外一流大学研修一段时间，费用主要由学校承担。”对此，严济慈班项目助理曾长淦教授很自豪。他说，去年严济慈班34名学生暑期

到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进入相关研究小组，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还能提高其外语交流能力，为今后的深造打下基础。

前不久，严济慈英才班 2010 级杨镇斌同学与密歇根大学的两位教授合作，在国际著名高能物理期刊《高能物理杂志》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今年 8 月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他，目前正在与这两位教授合作另一篇论文。杨镇斌表示，“科研上的收获，得益于去年暑期到密歇根大学两个月的交流。”

中国青年报 2014-5-24

中美本科教育之差异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一个差异是价值观教育。

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学生考完试后，很容易将背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学生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学习研究，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完成这门课程后，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会留下深深的烙印。另外一门于同年开设的核心课程是《美国政策的形成》。本科学院院长F·钱皮恩·沃德认为，“在这些在一起学习和思考的讨论过程中，最后学生不仅要‘知道’那些他必须知道的事实，同时，他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课程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懂得美国政策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形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够领导美国未来的政策。”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二个差异是重视方式。

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重视本科教育的方式比较单一。强调教授——特别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个“进步”显得何其荒唐！一个不给学生上课的人，还有必要称之为教授吗？

相比之下，美国顶尖大学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没有动摇过。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或者课上得不好，就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市政府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原因是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街，随时了解当下的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激发出创作灵感。郊区风景虽美，但不符合他们的教育教学要求。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三个差异是对本科招生的重视程度和对培养质量的监控。

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无不对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来说，大学里纯粹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招生办公室每年要处理来自全球的3.6万多份申请材料，每一份申请都经过严格审读，确保最终获得通过

的学生是最适合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此外，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非常严格。比如，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院校研究处负责对本科生培养质量进行调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建立了著名的“综合考试”制度，学生不仅要在入学时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入学，而且在毕业前还要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淘汰率居然达到了 30%。

相比之下，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录取，中国大学已经逐步蜕化甚至丧失了识别人才的基本能力。

正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 John W. Boyer 所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来说，没有一条轻松便捷的道路。”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制约。最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本科通识教育上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外表是容易学的，但里面那些看不见的真东西却只能依靠自己一点一点来摸索和研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中国青年报 2014-5-12

林建华：中国大学面临挑战与变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教育资源不均衡，整体教育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要求，而且，一些好的教学文化逐步被侵蚀，科学文化尚不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另一方面，经济转型、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应用和大规模课程共享直接冲击大学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国大学面临旧账未了、新债又到的双重压力。我们应当认清形势，勇敢地迎接挑战。

变化中的大学

大学的职能一直在改变。从传授知识、培养绅士，到发现新知、发明新技术，再到运用技术、服务社会，大学的职能经历了多次变革。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学主要以教学为主，少数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当时的大学形成并保持了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文化，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和学术人才。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经历了从教学型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与此同时，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接踵而至的教育多元化、校办企业、科研成果量化评价以及随后大学排名等等，原有的教学传统和教学文化被忽视被侵蚀；而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和追逐短期利益等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良好学术文化和氛围的形

成。随后的大学合并、大规模扩招、科研规模扩大、新校区建设等一系列机遇，使大学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延拓展，而教育体系、评价体系、人事体系、大学制度等内涵建设相对滞后。

今天的社会对大学充满期待，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都对大学提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或期望大学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为国家和地方的福祉和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或期望大学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广泛的优质教育，培养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和良好素质的劳动者，期望大学维护弱者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期望大学保持传统和学术独立，追求真理，培养社会精英，代表社会良知，评议和影响社会舆论，引领未来社会发展方向。

在变化中坚守

大学须在变化中坚守核心使命。纵使大学的职能经历万般演变，但根本使命始终是培养人才，要通过高水准的教学、卓越的学术研究和良好的社会服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的高素质人才，这是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最大贡献，也是学校长远声誉的基础。

大学须在变化中坚守自己基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履行使命的保障，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包含三个基本层面：首先，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学生为本。学生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学生的培养质量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学校应当调动一切资源，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其次，教师是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大学制度的设计、文化氛围营造的最终目的是使教师们的潜力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制度体系应当使每位教师都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与路径，应当使每位教师都能积极进取，追求卓越，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第三，大学须坚持学术独立，形成兼容并包、宽容失败的氛围；要相信教师、并在制度上要求教师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坚守诚信、代表社会良知，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浮躁不端、狭隘偏激、哗众取宠等违背基本学术文化的行为。

大学须主动变革

大学须变革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使命和价值上的彷徨，教学与学术文化上的偏颇，管理构架和流程上的紊乱，都会影响大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会使机构和人们困惑不安、束缚手脚。大学是学习和创造场所，高度依赖个体的创造性。只有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和制度氛围，才能使学校中的每个机构、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共同为实现学校的使命而奋斗。

改革大学内部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迫在眉睫。它须在大学使命和价值观的指导下，明确学校的愿景，确定阶段性的战略重点目标，制定配套的综合改革计划。为了计划任务的实现效率，须梳理管理构架和流程，明确责任、权力和资源配置方

案，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校的有限资源更加有效利用。大学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源，学校应当建立公平、公正、激励上进的人员聘用、评价与晋升、薪酬体系，积极帮助教职员看清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努力方向。

迎接信息时代

纵观今天的中国大学教育，一方面整体水平不高，教学目标迷失，教学内容陈旧；另一方面，各学校教学水平差距很大，有些学校的基本教育条件和课程质量都难以保证。从知识传授角度看，教师水准参差不齐，教学方法陈旧，不鼓励学生发展兴趣，不注重能力培养；从学生的角度看，应试教育使学生迷失方向，缺乏学习和创造的激情；如何重塑学生的梦想和激情，是我们重要的课题。更严峻的现实是：家庭较好、能够接受较好基础教育的孩子有更大的机会进好大学、拥有好的未来。大学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社会公平的主要障碍之一。

而当政府和大学苦苦寻觅提高公民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路径时，由信息技术和教育需求引发的大规模网上共享课程（MOOCs）浪潮又冲击着学校。显而易见，新技术降低了知识的获取成本，MOOCs的出现使大学不再是封闭的港湾，大学校园正逐渐失去独占独享已有知识的特权。一方面，MOOCs使大学之间竞争白热化，教育的成本、质量和竞争因为技术而透明，因透明而变得异常敏感；这迫使大学必须要加快教育教学改革，要更加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关注学生的个性和特点；不把教育质量放到第一位的大学将没有未来！另一方面，MOOCs也为缩小教育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教育公平和自主学习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近，大学的决策者不能也不应当孤芳自赏，应当摒弃狭隘的观念，积极推进网上课程共享，使更多的学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与此同时，MOOCs正在冲破教育市场的国家壁垒，挑战传统的国家、民族、文化观念。

中国大学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拥抱机遇，积极变革，迎接挑战。（作者：林建华，浙江大学校长）

光明日报 2013-11-20

分层分类视域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策略

摘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切实遵循人才培养规律，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主动跟进学生的主体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的能力水平、兴趣爱好、自主学习等方面因素，实施因材施教。应通过大工程观教育、特色教育、精英教育等分层分类教学，充分拓展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努力提高高校的“教育性因素”，从而适应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升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策略创新

一、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

基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化、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国际竞争程度的日益加剧，大学教育必须探索按不同层次与类别进行教学的路径。高校要能够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应通过多元化的培养手段，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此，关注学生不同特点与个性差异、兴趣取向与兴趣差异以及兴趣的拓展与变化，将学生区分成几大层次和类别，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别学生的不同情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实施分层分类培养，有利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品质，使不同水平的每位学生都尽可能得到发展。

1. 满足学生主体性发展

学生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既是教育的结果，也是教育的依据。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生命尊严，关注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把学生的发展置于主体性之上，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升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推动学生从现有的生命水平向着更高生命水平发展，是基于生命关怀的“全人教育”的本质诉求。为此，应构建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实施分类型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从牺牲人的个性追求回归到对人的尊重、关爱、理解和支持的理性平台。

2. 契合社会多样化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人们越来越关注人才培养的模式、规格、特色和质量等问题。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但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相比并不存在教育质量的优劣，而只是教育范围及数量的扩展，其本质区别不是培养不培养精英的问题，而是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问题，多样化并不排斥精英教育，精英教育也涉及多样化培养。社会需求逐渐多元化，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对知识能力的要求各不相同，由此教育类别、教育层次、教育形式、人才规格也必须多样化，这就客观地要求高校人才培养必须不断地调整教育目标、更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路径，为社会培养各类各级人才。

3. 促进国际竞争力提升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的较量更趋激烈，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赋予经济社会必须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使命。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在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的态势下，造就一大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和社会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通过分层分类培养，在培养创新精神方面营造宽松的环境，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良好条件，鼓励优秀学生迅速成长，是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高校实施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有效的教育教学应该远远地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并引导学生未来的发展，随着学生认知领域的不断扩大，未来领域的一部分又会演变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成为教育教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创造未来发展区也为学校教育和学生发展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

社会科学研究也表明，人的发展受先赋性因素（生理遗传及社会出身）和获致性因素（学习、教育、职业等）的影响，教育作为获致性因素对人的发展产生作用主要是通过教育教学过程来实现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与“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团队联合进行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认为：人才培养质量与高教资源配置格局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但资源条件优势并不等同于学生的高学习性投入和高教育收获，大学的“教育性因素”比学生的“先赋性因素”对其教育收获（知识收获、能力收获和价值观收获）的影响更大，不同区域和类型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应该更自信、更有效地发挥各自的教育优势，通过改进教育过程实现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增值。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消除每个学生的不同差异，而是要通过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和教师教学非同步化的方式尊重差异，落实教育公平，使每个学生的差异性、独特性得到最充分、最完美地显示。因此，针对学生基础、兴趣、特长、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教育教学过程提出不同要求是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1. 跟进学生能力水平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

美国学者卡罗尔认为，如果提供足够的时间（或是学习机会），再具备合适的学习材料和教学环境，那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分层分类教学不是简单提高或降低难度，而是根据学生在学业水平、基础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层次、类型相当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学班组织教学。学校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菜单”、设置不同的教学课时、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师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生采取差异化和层次化的教学方法，确定不同的教学进度，寻找激励不同层次、类型学生学习的突破点。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步骤在个人的起点上拓展已有的知识并获得成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胆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对“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理论力学”和“计算机基础”等课程实行分级教学，如“高等数学”分5个教学层次，不同教学层次开课对象不同、学时不同、学分也不同。

2. 跟进学生兴趣爱好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进行学习、探究的源泉和动力。基于兴趣的学习将提高成功的几率，基于兴趣的探究有助于创新的产出。应重视学生的兴趣取向与兴趣差异，在人才培养中关注学生兴趣的变化。大学生尚处在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视野的拓展、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增加，兴趣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学校要考虑这些变化，如制定辅修-双学位、专业二次选择等政策，为学生开辟进一步实现专业兴趣的途径。南京大学探索并实践了“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发展需要，跨院系、跨专业、跨年级选修课程，对于同一门课程的多个平行班，由学生自主选择任课教师。

3. 跟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方式，完善导师导学体系，变“主宰”为“主导”，变“管理”为“服务”，加强学习策略和方法的训练指导，帮助学生理性地、高效地自主选择课程和专业，构建起多元学习模式。北京师范大学给予学生多阶段（贯穿大学四年全过程）和多方面（覆盖所有培养环节）的自主选择权，如一、二年级年末有专业分流、专业二次选择以及辅修-双学位的专业再选择；三、四年级有专业课程、科学研究和职业方向等与未来发展相结合的多元选择。

三、高校实施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1. 高素质应用型（就业创业类）人才培养——大工程观教育

高级应用型人才主要从事生产一线的技术开发、技术生产和生产管理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而培养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持，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责。

为此，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培养掌握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面向区域与工业生产一线的实际，具有较强的技术集成、技术移植、技术实施和技术推广能力的现场工程师。应用型人才应以学科为支撑、以专业为基础、以岗位为核心，按“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培养原则和“大工程观”的办学理念，坚持通识课实用、学科基础课适用、技术基础课管用、专业课能用，强化基本技能层、综合应用能力与初步设计能力层、较强工程实践与适度创新能力层三个层次的实践训练，适度开设前沿性、导论性课程，提升学生的知识集成水平，发展其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

2. 高素质专业型（专业学术类）人才培养——特色教育

满足于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的特殊需求，应以知识探究为基础、能力建设为核心、人格养成成为根本，按照“小班授课、精讲多练、因材施教、特色发展”的办学思路，培养具有基础知识扎实、专业素养超群、实践能力较强、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型人才。应以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为目标，强化通识教育和跨学科基础教育，强化工程能力与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参与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如常州大学紧紧依托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需求开设“教学改革特色班”，按照“基础厚、领域宽、起点高、内容新、进度快、特色强”的原则进行课程设置，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重构符合石油石化专业要求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每个本科专业最核心的学科专业课程。“特色班”实施学业导师制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择合适的课程模块，导师通过定期谈话、项目指导，言传身教，引领学生的全面成长。学校选聘校内外优秀教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案例式教学；加强实践环节，鼓励并提供条件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实验和创新实验，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生产实践，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专业学科的前沿领域，拓宽知识面，加强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精神的培养。

3. 高素质复合型（交叉复合类）人才培养——精英教育

立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国际竞争力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以“汇集优秀生源、整合优质资源、创新培养模式、打造复合型人才”为办学思路，培养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具有较宽的国际化视野、良好的表达与沟通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领导潜质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实现人才培养由工程型、专业型向复合型的显著转变。

以综合素质养成成为前提，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创新教育为核心，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如常州大学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精心打造“精英学堂”——华罗庚学院。学生在前两年进行大类培养，后两年按学生自由所选专业培养；实行学业导师和学术导师双导师制。学生根据学校设计的精英化教育课程模块，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成才通道。通过聘请校内外教学名师或优秀教学团队，借助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及系列创新活动项目等课程模块，加强学生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的训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开放各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创新中心、实践基地等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优先考虑学生参加各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创新基金项目、学科竞赛等；鼓励学科交叉，通过配备交叉学科导师、选修精品课程、组建实践创新训练团队、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等，实行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作者：张德高，常州大学）